

陕西关中地区秦派二胡的生态音乐学研究

李梓轩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贵阳 550000, 贵州, 中国

摘要: 生态音乐学是一门交叉学科, 它以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音乐与声音, 考察其与人类社会文化实践的交汇及其同自然环境的关系。秦派二胡——通常被称为“陕西二胡”——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域流派, 其演奏技法与风格特征源自陕西本土音乐语汇, 包括陕北民歌与关中戏曲。本研究通过考察关中地区的生态与环境影响, 并以代表作《秦腔主题随想曲》为重点, 对陕西二胡的演奏实践展开研究。通过音乐分析与语境阐释, 本文揭示了地域环境因素如何塑造秦派二胡的音响美学与技术调适。研究结论对二胡教学具有教学法意义, 也有助于提升音乐学术研究中的环境意识。此外, 本研究还为未来有志于研究秦派二胡传统的学者与演奏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参考框架。

关键词: 生态音乐学; 秦派二胡; 关中地区

Ecomusicology of Qinpai Erhu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of Shaanxi

ZiXuan Li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0, Guizhou, China

Abstract: Ecomusicology constitute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at applies ethnomusic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to the study of music and sound as they intersect with human social and cultural practice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Qin pai erhu—commonly referred to as "Shaanxi erhu"—represents a distinctive regional school characterized by specialized performance techniques and stylistic features derived from Shaanxi's indigenous musical idioms, including northern folk songs and Guan Zhong opera. This study offers an investigation of Shaanxi erhu performance practice by examining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f the Guan Zhong regio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exemplar work "Qin Qiang Opera Theme Capriccio". Through musical analysis and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 we demonstrate how regio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have shaped both the sonic aesthetics and technical adaptations of Qin pai erhu. The findings hold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erhu instruction and contribute to heightene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within musical scholarship. Moreover,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future scholars and performers seeking to engage with the Qin pai erhu tradition.

Keywords: Ecomusicology; Qin pai erhu; Guanzhong region

一、引言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Ufascience Publisher.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文章引用: 李梓轩. 陕西关中地区秦派二胡的生态音乐学研究[J]. 社科与人文前沿, 2026, 4(1): 84-91.
DOI: <https://doi.org/10.61784/fssh11>

生态音乐学是一门复杂而多面的学科，融汇了多种要素。作为一个日益重要的交叉领域，它综合运用了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生态学、文化研究与环境科学的方法 [1]。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学界对环境问题关注度的提升，该领域在北美获得了大量学术关注。其渊源可追溯至若干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人物，尤以作曲家 R. Murray Schafer 为代表 [2]。生态音乐学超越了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界限，同时吸纳了两个领域的内容 [3]。其概念根源可追溯到 Gardiner 于 1832 年的著作，该书明确探讨了音乐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Titon 将生态音乐学定义为“在环境危机时期对音乐、文化、声音与自然的研究”，强调其在当代环境论述中的现实意义。此外，生态音乐学采用跨学科框架，将音乐与声音研究同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的洞见相结合 [4]。

陕西省地处中国腹地，与八个省市接壤，是中国毗邻区域最多的省份。作为中国的中心地带，陕西兼具深厚的历史底蕴、多元的文化面貌与壮美的自然景观 [5]。该省拥有数千年的历史，在塑造国家历史与文化脉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历史与文化价值之外，陕西还以其秀美的自然风光著称 [6]。全省地貌多样，既有风光旖旎的秦岭山脉，也有干旱的黄土高原。从地理上看，陕西自南向北可划分为三大区域。北部以黄土高原为主，秦岭山脉则分隔了中部与南部 [7]。位于秦岭以北的中部地区被称为关中平原或渭河平原，而秦岭以南的地区则被称为秦巴山区。本研究专门聚焦于陕西的中部地区。

本研究采用生态音乐学的框架来考察秦派二胡，为这件中国传统乐器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具体而言，本文聚焦于秦派二胡的代表性作品《秦腔主题随想曲》，从音乐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入手加以考察。研究目标如下：

- （1）从生态音乐学的立场考察秦派二胡音乐的风格演进，并着重关注关中平原。
- （2）结合陕西省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分析代表性作品《秦腔主题随想曲》。

二、文献综述

（一）秦派二胡

二胡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卓越地位，既是中国传统音乐遗产的重要象征，也是中国民族乐队编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8]。有关二胡的历史文献记载可上溯至宋元时期的《元史》（1310 年）等重要著作。在西方世界，二胡通常被称为“中国小提琴”或“中国二弦琴”。

秦派二胡又称陕西二胡，是发源于陕西省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二胡演奏风格 [9]。陕西省，尤其是西安市，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丝绸之路在东西方之间建立起关键的文化与经济联系。陕西的文化景观因人口构成的多样性而更加丰富，汉族、回族及其他各民族共同为其充满活力的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秦派二胡是一种独特的二胡音乐类型，以专门的演奏技法与浓郁的地域影响为特征。它通过对陕北与关中音乐元素的吸收与改造而演进，并将其融汇为独具特色的陕西音乐风格。

从社会环境的视角来看，陕西二胡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在二胡音乐界崭露头角，这一时期正值二胡音乐语汇与技法的探索、发展与拓展阶段，此进程延续至今已逾六十年。Jin 强调了秦派二胡与其地域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地域特征在其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作用。

从自然环境的视角来看，秦派二胡作品的音乐素材取自关中地区与陕北本土的民歌与戏曲音乐。这些作品的独特风格深受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而自然环境在塑造地域音乐审美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环境与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界定秦派二胡音乐地域特征的主要来源。

（二）陕西关中地区的特征与文化

陕西省简称“秦”，深深植根于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秦”是中国古代“区

域文化”的杰出典范。关中平原素有“八百里秦川”之称，北接黄土高原，南依秦岭，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自汉代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繁盛，使之成为中国正统文化保存与传承的重要中心。关中平原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河网密布，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因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农耕文明的摇篮。

Huang 指出，依据区域的总体特征，陕西音乐可划分为三个部分：以民歌为主的陕北，作为戏曲与器乐重镇的关中地区（陕西中部），以及音乐形式多样但影响相对有限的陕南。陕西作曲家在受关中地区音乐遗产启发的创作中广泛汲取了这些传统音乐元素，由此产生了在国内外均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并促成了众多优秀作曲家与音乐作品的涌现。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显示，发源并兴盛于关中地区的戏曲声腔占陕西全部戏曲的 52%。数百年来，关中地区孕育了众多具有影响力的音乐品种，包括秦腔、碗碗腔、眉户、阿宫腔、华阴老腔、合阳线腔、同州梆子、西安鼓乐、关中道情，以及佛教与道教音乐。其中，源流可追溯至唐代的西安鼓乐尤为突出，是关中地区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西安鼓乐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陕西音乐遗产中占据卓越地位。

近年来，关中地区无疑已成为陕西省最具活力的器乐重镇，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音乐与地方音乐的深厚传统。代表性作品与作曲家包括：二胡独奏曲《渭水河畔》；管弦乐作品《欢庆新年》（尤达民作曲）；二胡独奏曲《眉户调》与《秦腔主题随想曲》（鲁日融与赵震霄合作创作）；管弦乐作品《长安社火》（鲁日融与赵季平合作）；古筝协奏曲《骊宫恨》；以及《骊山吟》《出水莲》《音诗——边塞叙事曲》等管弦乐作品；还有小提琴与管弦乐作品《碗碗腔主题随想曲》。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Denzin 和 Lincoln 强调，质性研究需要从多样化的经验材料中收集资料，包括个案研究、个人叙事、自省性记述、生活史、器物与创作作品，以及观察性、历史性、互动性与视觉性文本。本研究以生态音乐学与历史语境为视角考察秦派二胡，研究结论即由这些分析框架所形塑。

本研究聚焦关中平原，以内容分析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考察当地戏曲文化，本研究力图揭示塑造地域文化与音乐发展的语境因素与风格特征。按照 Krippendorff 的定义，内容分析是一种系统而客观的方法，通过识别特定特征从资料集中提取相关信息。在本研究中，内容分析是唯一采用的方法。Smith 指出，内容分析是考察质性材料的基础性路径，其重点在于言语内容，但同样可有效地应用于非言语资料。

（一）资料收集

本研究收集三类资料，以探讨陕西二胡及其与地方文化的关系。第一，运用关中地区的生态与环境资料，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分析地方音乐的形成与特征。第二，考察关中平原特有的生态资料，通过比较与分析这些数据来识别陕西二胡的共有风格特征。第三，通过对关中地区《秦腔主题随想曲》的研习与观察收集民族志资料，考察陕西地方文化对陕西二胡的发展与特征所产生的影响。

（二）资料分析

本部分所分析的资料相当复杂，因为地理资料涵盖了包括历史与自然环境因素在内的一系列复杂要素。分析主要采用乐谱分析法，聚焦三个关键维度：考察不同时期代表性作品的乐谱，梳理秦派二胡自西安音乐学院发端至今的发展脉络；研究陕西戏曲的乐谱；以及分析陕北民歌的乐谱。上述分析依据《音乐分析教程》、《戏曲音乐概论》与《民族器乐》中所阐明的方法展开，并辅以自反性的研究路径。

西安音乐学院的秦派二胡代表着一种独特的二胡演奏风格，其中只有二胡专业人士才被视为“局内人”。掌握秦派二胡需要以专业二胡演奏者的视角去理解与诠释音乐。因此，这种关注往往忽视了同一文化语境中的相关学科（如戏曲）及其对秦派二胡的影响。Wang 指出，非二胡专业人士虽然无法从二胡演奏者的视角分析其风格，却能够客观地辨识其与其他音乐形式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旋律与技法方面。在研究秦派二胡时，本研究以“局外人”的视角观察对象，同时努力融入陕西的地方文化，以“局内人”的视角与身份去体验它。

四、研究发现

（一）秦派二胡的生态批评维度

生态批评是一门考察文学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交叉学科，其关注点在于人类文化——尤其是通过文学——如何反映、影响自然与环境问题并与之互动。就其核心而言，生态批评力图通过文学分析对人类文化加以批判，探究认知过程、文化实践与社会发展如何塑造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感知及与之的互动。作为一种文化产物，音乐同样受到其历史与地域语境的影响，其创作与接受均深深植根于周遭环境之中。

1. 关中平原的自然环境

关中平原又称渭河平原，因其位于关中地区的中心位置而得名。从地理上看，它对应于渭河地堑，南依秦岭，北靠北山，位于陕北高原与陕南山区之间。平原西起宝鸡、东至潼关，绵延约 360 公里，宽度不一，最宽处位于西安以东，约 100 公里，而其西端在宝鸡附近收束为峡谷。海拔自西向东逐渐降低，西部为 700 至 800 米，东部最低处略高于 300 米，平均海拔约 520 米。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纵贯平原的中轴线，在两岸塑造出大面积的阶地平原。以河流为中心向外辐射，地貌呈现出有序的过渡，依次涵盖河床、河流阶地、黄土台塬、山前洪积扇与山地，这些共同构成了该区域的主要地貌特征。

关中平原以丰饶的农业景观著称，其湿地与河岸地带也孕育了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其肥沃的土壤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黄河含沙水流所沉积的富含养分的冲积物。作为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该平原是小麦、玉米及各类水果的种植中心。关中平原常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摇篮”，曾是中国古代十三个王朝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其自然环境深刻地塑造了该地区的历史与文化走向。平原耕地广袤、河网纵横，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在其《上林赋》中特别提到长安附近的八条河流。在这些水系之中，渭河作为主要河流最为突出，贯穿整个关中平原。

关中地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兼具半干旱与半湿润特征。这种气候格局造就了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降水分布不均，冬季寒冷、夏季炎热，春季升温快、秋季降温急，干湿季节区分明显。直至公元 906 年唐朝灭亡为止，关中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西安作为众多王朝的都城，累计建都时间长达 1077 年，在中国古都中无出其右。该地区的历史地位可归因于其战略性的地理位置与优越的自然环境。作为关中平原，它所处的中心位置既提供了防御上的优势，也带来了相应的隐患。该地区属半湿润暖温带，年平均气温为 12 至 13 摄氏度。

2. 关中的文化环境

陕西省关中地区常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独特的地理景观对之影响至深。关中因其历史地位而闻名，是中国多个古代都城的所在地，其中包括长安（今西安），它曾是西周、秦、西汉、隋、唐等王朝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该地区拥有大量的历史遗迹与考古文物，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兵马俑，它是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陵的标志性象征。

关中的文化遗产极为多元，涵盖传统习俗、节庆、民间艺术与饮食。该地区因其在音乐、舞蹈与戏曲方面

的独特贡献而享有盛誉，尤以秦腔为代表——它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戏曲形式之一。作为历史上的交汇之地，关中曾是各种宗教与哲学传统的汇聚点，包括儒家、道家与佛教。法门寺与西安大雁塔等著名佛教遗迹彰显了该地区的精神文化意义。从历史上看，关中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通过商品、思想、宗教信仰与艺术实践的往来，促成了与多元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

关中地区拥有长达数千年的建都史，始于公元前 1134 年西周王朝的建立。周王朝东迁之后，关中的秦人人口显著增长。唐朝常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始于公元 618 年，历经 21 位皇帝，延续 289 年。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关中曾是十一个王朝的京畿之地，接纳过三位流亡的皇帝，也见证了四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兴起。在这些王朝之中，秦、汉、唐尤为集中地体现了该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地位。

3. 生态环境对秦派二胡音乐的影响

陕西二胡代表着一个独特的二胡音乐流派，以独到的演奏技法与鲜明的地域属性为特征。它通过对陕西本土音乐元素的吸收与创新而演进，并从陕北民歌与关中地区的戏曲传统中汲取灵感。

陕西关中音乐植根于中国陕西省关中地区，其独特品格体现了该地区深厚的文化与历史积淀。关中音乐折射出多元文化影响的汇流，其独特性得益于该地区在历史上作为中国文化与政治中心的角色。它融合了汉族、回族及其他民族传统的元素，也吸纳了通过丝绸之路交流而来的文化影响。

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自律性。然而，其创作与接受又深深嵌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与地域环境之中。关中音乐以豪迈粗犷的节奏与自由舒展的旋律结构为特征，以其表达从欢欣到悲怆的宽广情感谱系的能力而著称。叙事在关中音乐中占据关键地位，在其戏曲形式中尤为突出。唱词常常讲述历史事件、传说与地方民间故事，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

陕西中部的音乐形式涵盖多种戏曲类型，包括秦腔、碗碗腔与眉户等。秦腔作为关中音乐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之一，常被称为“中国梆子戏之母”，尤其值得关注。它以高亢激越的演唱风格、火爆质朴的表演以及富有动感的打击乐伴奏而著称。秦腔音乐以其独特的音阶结构为特征，这一结构在地方方言与文化的影响下逐步演进，最终形成了完整的表演体系。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形式之一，秦腔直率豪放的声腔可分为两大调式体系：欢音与苦音。

在陕西省内，由于地方方言与语音的差异，秦腔演化出东、中、西、南四种地域风格。其中，东路与西路的历史最为悠久。自清末以来，中路风格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最终成为秦腔的主要代表。根据方言调值的分析，关中方言缺少普通话中的“阳平”，而“降升调”较少、“低降调”较多。这一声调特征与当地民众直率的性格特点相关联。语言的声调格局影响演唱的声腔风格，而声腔风格反过来又塑造了器乐的旋律特征。

（二）秦派二胡的音乐学审视

1. 秦派二胡的形成

二胡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乐器，其源流可追溯至唐代。二胡以其表现力的多样性著称，涵盖从基本运弓法到繁复指法的广泛技法，充分展现了演奏者卓越的艺术造诣。据 Feng 研究，二胡是在漫长的文化融合过程中产生并演进的，融汇了胡文化与中原、西域的影响。唐宋时期，二胡在中国宫廷音乐与民间传统中均获得了显要地位。

秦派二胡的演奏形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伴奏形式，用于戏曲音乐与民歌之中。第二类为独奏形式，依托专业的创作框架与高超的演奏技法而发展，主要由西安音乐学院创作并演出。秦派二胡代表着一个独立的二胡音乐流派，以独特的演奏技法与鲜明的地域特征为标志。这些特质植根于陕西音乐传统，通过对本土元素——包括陕北民歌与关中地区的戏曲风格——的吸收与创新而形成。

陕西音乐风格的发展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密切交织。公元前 4 世纪的战国时期,“胡”是对西北各少数民族的统称,其中包括匈奴,其音乐被称为“胡乐”。这种文化交流在秦汉时期进一步深化,疆域的拓展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往来。乐府等机构的设立旨在采集与保存各民族的民间音乐。由此,各民族与外来的音乐元素及乐器被引入关中地区,促成了中原文化与“胡”文化的融合。

例如,汉军采用了一种源自“北狄”(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部族)的演奏形式,称为“鼓吹乐”,其后逐渐传入内地。此外,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促成了文化与经济的交流。由此,西域的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形式被引入汉代都城长安。

至公元 6 世纪的隋唐时期,“胡”的所指扩展至粟特人、波斯人、蒙古人、契丹人与突厥人。“胡”文化涵盖三大主要传统:游牧、渔猎与畜牧。唐代频繁而兴盛的交流极大地丰富了该地区的文化肌理。唐代音乐,尤其是宫廷音乐,并非纯粹的中原音乐,而是本土传统与周边民族及外来文化艺术贡献的融合体。

笛与腰鼓等乐器是唐代仪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西北各民族传入。唐太宗时期确立的十部乐中,有八部源自周边与外来文化,包括龟兹乐、高丽乐、西凉乐与天竺乐。这些发展凸显了跨文化互动对陕西音乐传统演进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陕西音乐历史悠久,可上溯至远古时代。历经各历史时期数百年的演进与发展,它孕育出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陕西音乐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为特征,体现了中国历史所固有的多样性。此外,它还受到不同历史阶段文化影响的塑造,这一点反映在其多样的音乐特征之中。

周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音乐特征别具一格。这一时期的音乐以和谐与秩序为首要追求,强调其教化与道德功能。周代的音乐风格力求旋律与节奏之间的平衡,旨在达成宁静而典雅的审美境界。相比之下,秦代作为另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以力量与强度为着眼点的独特音乐风格。秦代音乐强调动态的能量与激情,同时认识到其鼓舞与激励的作用。在秦代,音乐在彰显国家实力与精神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影响延及后世,其对动感与力度的强调成为中国音乐核心特征的基础。从汉代到唐代,音乐逐渐摆脱了周、秦两代所特有的礼仪性倾向,转而聚焦于音乐的审美与艺术价值。汉唐时期的音乐深受哲学思想的浸润。在这一时期,音乐创作不仅注重情感与个性的表达,也常常传达深邃的思想与哲理意蕴。

在汉唐盛世,陕西音乐展现出独特的风格与特征,洋溢着非凡的生命力与艺术魅力。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不仅承继了先秦的音乐传统,也充分吸收了外来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音乐形态。唐代乐舞是陕西音乐在唐代的另一重要表现。唐代乐舞风格豪迈、绚烂、宏丽,兼具精妙而富于表现力的表演技巧,生动地凝聚了这一辉煌时代陕西音乐的独特魅力。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日益多元,将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外来音乐影响的吸收创新融为一体。

2. 秦派二胡的代表作品:《秦腔主题随想曲》

根据杜亚雄的《中国民族基本乐理》,中国乐理与西欧乐理虽在表层上可能呈现出相似之处,但其渊源却出自迥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国乐理深受先秦哲学辩证思维的影响,由此形成了独特的音乐表达体系。相比之下,西欧乐理则在一个更为结构化与自足的框架内运作。

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作为十三朝古都,演化为一个文化熔炉。多元传统的汇聚使其音乐与戏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且富于适应性的体系。该地区持续吸收并整合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域外的音乐影响,不断丰富其鲜活而富于表现力的品质。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时期有大量外来与西域音乐传统融入本地曲目,进一步丰富并提升了传统音乐的面貌。

关中戏曲音乐借助黄河、渭河、汉水等水路以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通道,将其影响扩展至周边地区。这

一传播促成了独特音乐风格的形成，如陕北的“碗碗腔”。关中戏曲的音乐风格以“苦音”与“欢音”的独特对比互动为特征，借助“欢音”腔来传达丰富多样的情感表达。“苦音”给人以哀婉柔和之感，而“欢音”则明快欢愉。这种富于张力的组合构成了“半欢半苦”的调性基础，体现出界定关中戏曲的细腻灵活性与调性模糊性。

大多数关中戏曲以“苦音”为主，并运用“苦音”腔与“欢音”腔来构筑形成对比的旋律形态。“苦音”以柔和悠长的音质为特征，传达哀愁之感；而“欢音”则以明亮轻快见长。在结构上，关中戏曲音乐围绕微升宫的旋宫展开，包含向商的微升与向羽、商的下行，并通过连续跳进构成音程。四声音阶体系中连续跳进与下行的交织，加之其交叉旋绕的旋律特征，凝聚了关中戏曲独特的音乐个性。关中方言的根本特质体现为音调序列递进的螺旋式排布，并通过关中方言独特的语音字调加以表达。

《秦腔主题随想曲》是一部重要的民族管弦乐作品，由西安音乐学院的著名作曲家、教授赵震霄与鲁日融于1958年创作。其创作初期是对秦腔曲调进行即兴演奏与编配，而秦腔这一音乐形式深深植根于陕西民众的文化认同之中。这些片段后来被提炼为一部完整的乐谱，并融入了传统的秦地乐器。

鲁日融祖籍湖北省，是“秦派二胡”发展进程中的开拓者与关键人物，而秦派二胡已成为地域音乐风格的标志。1998年，在参与陕西省郃县的一次农村劳动活动期间，鲁日融深入体验了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他对乡间戏曲与民间曲调的接触深刻影响了他对陕西音乐遗产的理解与诠释，并促成了秦派二胡独特品格的形成。

这部作品从陕西本土的秦腔中汲取灵感，将秦腔曲牌的元素融入其框架之中。其节拍布局以“散板—慢板—快板—散板”的序列为特征，构成了秦腔音乐集成的基础结构。虽然被归为随想曲，但该作品遵循了中国传统对随想曲体裁的理解，体现出中国传统戏曲作品中常见的结构原则。

该作品的节拍分为五个部分，按“散板—慢板—快板—散板—快板”的顺序排列，其结构与节奏特征令人联想到唐大曲。唐大曲指隋唐时期的大型歌舞形式，亦称大曲或燕乐大曲。它是一种融合器乐、声乐与舞蹈的成熟而完整的艺术形式。唐大曲以多段体结构为特征，是一种涵盖多样音乐与艺术表现的大型作品。这种形式的融合体现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宏伟与复杂，也彰显了其作为后世传统音乐与戏曲发展先声的作用。唐大曲一般分为三个明确的部分。第一部分称为“散序”，即散板，通常由若干器乐段落构成，起引子作用。第二部分“歌头”，又称“中序”或“排遍”，构成音乐的主体。这一部分以较慢的速度为特征，以慢板为主，常包含多段慢唱，有时伴以舞蹈。第三部分“破”，标志着急速而富于动感的收束。综上可以推知，《秦腔主题随想曲》的结构形态反映了根植于唐大曲创作框架的一种演化。

《秦腔主题随想曲》借助其音乐背景有效地传达出深沉的哀伤之感。这种情感共鸣是众多秦派二胡作品的共同特征，它们常常运用音阶中凄楚的“fa”与“si”两音。在基础乐理中，“fa”与“si”被视为特性音，以其显著的游移与不稳定性为标志。这些特质天然地强化了作品的悲怆色彩，加深了其情感冲击力。通过对悲情的强调，音乐唤起了深切的哀叹之感。

除“fa”与“si”这两个哀婉的音之外，一些作曲家还融入了苦音宫调与商调式，以进一步丰富作品的情感深度。在《秦腔主题随想曲》中，开始部分主要强调“do”与“sol”两音，为起始乐段赋予了沉郁而内省的品质。在力度与速度方面，该作品避免使用极端的力度记号，如“突强”（sfz）或“ppp”。相反，力度的变化通过节奏与速度的变化被微妙地塑造出来，体现出音乐形式自然的起伏流动。

秦派二胡演奏技法的发展与秦腔板胡的演奏技法密切相关。在板胡演奏中，其技法与秦腔的旋律结构高度契合，映射出其声腔独特的音调品质。这种呼应体现在诸如“线腔”与“包腔”等特征之中，它们凝聚了秦腔

音乐风格的精髓。此外，板胡独特的技法——如捏弦、滑抛、甩弓与拉弓——对秦派二胡演奏方法的演进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些风格要素在二胡曲目中得到了改造与提炼，成就了其独特的艺术表现。

这部作品与陕西地方戏曲的秦腔音乐紧密相连，其演奏技法对戏曲声腔音色的模仿即是明证。“欢音”的旋律框架突出“mi”与“la”两音，而“苦音”的骨干音则为“fa”与“si”。虽然两种音阶基于同一调性体系，但它们因各自的骨干音而相区别，这些骨干音界定了其独特的情感品质。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种音阶中，“fa”与“si”均偏离标准律制，“si”略低而“fa”略高。这些音高偏离被称为“特性音”，在塑造陕西风格二胡独特的音乐个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种特殊音阶对秦腔影响下的二胡曲目所具有的独特音色与表现力贡献甚巨。

二胡以其歌唱性的表现力著称，自然而然地吸收了源自模仿戏曲声腔音响与情感表达的特色技法。这些技法与对欢音、苦音调式格局的理解与掌握密切相关，也与陕西戏曲特有的特性音密不可分。就左手而言，垫指滑音、抓弦、压弦、食指按弦（或滑弦）、揉弦与回滑音等技法被频繁运用，尤其是在与特性音相配合时。右手则通过强调发音的起始点来与这些技法相呼应。运弓速度的调整以及对弓段伸展的控制均被精心协调，以强化并支撑左手所执行的细腻技法。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二胡独具陕西戏曲韵味的演奏风格的基础。

五、结论

本研究从生态音乐学的视角考察秦派二胡，探讨生态环境、自然影响与文化语境在塑造其音乐身份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言，本文考察了促成秦派二胡形成的关键因素，并通过代表作《秦腔主题随想曲》凸显其音乐特征。这一分析揭示了秦派二胡音乐与当地民众生活之间的深刻联系，说明它是表达与传递人们思想情感的媒介。自然环境唤起独特的感官体验，孕育独特的思想与情感，而人文与社会环境则塑造出多样的音乐风格。作为人类与自然及社会环境互动的直接而真切的表达，音乐本身即映照其所处环境的动态。陕西省秦派二胡的独特风格深受关中地区不断演变的自然景观的影响，凸显出音乐与其生态、文化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

参考文献

- [1] Allen A. Ecomusicology: Ecocriticism and musicolog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 2011, 64(2): 391-394.
- [2] 陈洪文. 戏曲音乐概论. 西安: 西安音乐学院出版社, 1993.
- [3] 程天健. 民族器乐. 西安: 西安音乐学院出版社, 1993.
- [4] 鲁日融. 秦派二胡的形成与发展.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11(1): 58-61.
- [5] 马波. 地域文化对当代陕西作曲家音乐创作的影响. 音乐创作, 2020(2): 136-142.
- [6] 马志强. 二胡演奏技术的历史演变及在现代音乐教育中的应用. 艺术研究, 2025(1): 110-112.
- [7] Schafer R M.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Toward a theory of soundscape desig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7.
- [8] Thrasher A R.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9] Tilton J T. The nature of ecomusicology. *Música e Cultura*, 2013, 8(1): 8-18.